

雷马克文集

朱雯译

里

斯

本

之



夜



雷马克文集

里斯本之夜

◎ 朱

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ich Maria Remarque
DIE NACHT VON LISSABON

国际中文版授权 ©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pyright © 1962, Erich Maria Remarqu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Mohrbook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雷 马 克 文 集
里 斯 本 之 夜
朱 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193,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327-1665-1/I·997

定价: 14.80 元

我目不转睛地瞅着那条船。它亮着耀眼的灯光，停泊在塔古斯河上。我来到里斯本虽然已经有一个星期，可是对它那种无忧无虑的灯火通明，还不太习惯。在我离开的那几个国家里，一到夜晚，个个城市都象煤矿一样漆黑，昏暗中的一盏提灯，简直比中世纪的瘟疫还要叫人害怕。我是从二十世纪的欧洲来的。

那条船是一艘客轮；这会儿正在装东西。我知道明天下午它就要出航了。在没有罩子的灯泡那刺目的光芒里，一箱箱的肉啊、鱼啊、罐头食品啊、面包啊，还有蔬菜啊什么的正在往下面货舱里装；搬运工人正在把行李往轮船上运，把一只只箱子、一个个捆包悄没声儿地扛起来，仿佛它们一点重量也没有似的。那条船正在为出航作准备——如同洪水时代的方舟一样^①。它正是一艘方舟。在一九四二年的那几个月里，每一艘离开欧洲的船都是方舟。亚拉

① 《旧约·创世记》第7章第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

腊山^①乃是美国，而洪水还在一天天涨起来。好久以前，洪水就已经淹没了德国和奥地利，现在淹到了波兰和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巴黎也都沉在水里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已经闻到一股渗水的味儿，而西班牙也不再是安全的了。葡萄牙的海岸成了流亡者的最后希望。对他们来说，正义、自由和容忍要比家庭啊、生活啊更有意义得多。这是通往美国的大门。要是到不了那边，那你就倒霉了，你就会注定着要在领事馆、警察所、政府机关的丛莽之中奔走得精疲力尽，那里既不给你签证，也不让你弄到工作和居住的许可证，那是一个拘留营、衙门的文牍作风、凄凉寂寞、怀乡病以及叫人萎顿的普遍冷漠的丛莽。在战争、恐惧和苦恼的时日，照例是这样：作为个体的人不再存在了；只有一样东西是重要的，那便是一张有效的护照。

那天下午，我到伊什图里尔娱乐场去赌钱。我还有一套漂亮的衣服，他们便让我进去了。这是向命运讹诈的孤注一掷。我们那张葡萄牙的居住许可证，再过几天就要满期，而露特和我都没有别的签证。我们在法国曾经考虑过一些计划，草拟过一张可能去纽约的船期表。眼下停泊在塔古斯河上的这条船，在我们的船期表上是最后的一艘。可是早在几个月前，船票都已经卖光了，我们既没有美国

① 《旧约·创世记》第8章第1节：“上帝记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

的签证，而船费也还短缺三百多元。我至少得试一试筹集这笔款子，用里斯本一个外侨唯一还可以采用的办法——赌博。这是个荒谬的念头，因为即使我把钱赢到手，要让我们能搭上那条船也还得出一个奇迹。但是，在危急和绝望的时候，你会相信奇迹；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你就完蛋了。

我们还剩下的六十二元，结果被我输掉了五十六元。

夜已经很深，码头区差不多没有什么人了。可是没隔一会儿，我发觉有个人就在那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最初，他漫无目的地在踱来踱去，随后他停下来，也开始朝那条船盯着看。又是一个走投无路的难民，我想，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可后来，我发觉他正在朝我打量着。难民对警察的恐惧是怎么也不会消失的，即使在他睡着的时候，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时候——因此我就装出一副厌烦的无动于中的神气，转过身子，挪步离开码头，走得慢悠悠的，好象一个毫无理由感到害怕的人。

一会儿之后，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继续往前走，可并没有加快脚步，心里在思忖，万一我被捕了，怎么才能让露特知道。码头尽头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如同一羽羽蝴蝶在黑夜里沉睡着，离得还太远，我没办法奔到那边去，消失在一条条湫隘街道的迷阵中间。

这会儿，那个人已经走到我身边了。他个儿比我稍微矮些。“你是德国人吗？”他用德国话问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

“是奥地利人？”

我没有回答。我望着那一幢幢彩色粉墙的房子，觉得它们挨近得实在太慢了。我知道有些个葡萄牙警察，德国话讲得才好咧。

“我不是警察，”那个人说。

我不相信他的话。他穿的是便衣，可是在欧洲，我给这种穿便衣的人逮捕，已经有五六次了。我有证件，而且还挺不错，是在巴黎由一位从布拉格来的数学教师给我改制的，可是经不起仔细的检验。

“我看见你在盯着那条船，”那个人说。“那叫我估摸……”

我漫不经心地打量了他一眼。看样子他的确不象是一个警察，可是最后一次在波尔多把我抓去的那个穿便衣的人，一副可怜样子，简直象是在坟墓里待了三天的拉撒路^①，其实却是个最最残酷的家伙。他明明知道第二天德国人就要开进波尔多，却还把我拖了进去，若不是几小时之后有个好心肠的典狱长将我释放出来，我可早就完蛋了。

“你要去纽约吗？”那个人问。

我没有搭理。只消再走二十码路就行了，到那时，万一有必要，我可以把他击倒，自己撒腿就逃。

“这儿，”那个人说，把手伸进衣袋，“是搭乘那条船的

① 《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两张船票。”

我看见那两张票子。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不清那上面写的是什麼。不过我们走的路已经够多了。现在停下来也不会出什麼事的。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用葡萄牙话问他。这种语言，我已经学会了几个词。

“这船票你不妨拿去，”那个人说。“我不需要它们了。”

“你不需要它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它们了。”

我瞪着他看。我理解不了。他的确不象是一个警察。如果他真是要逮捕我的话，那也用不着搞这种异想天开的诡计。可是如果这两张船票是好用的，那他自己又为什么不用呢？而他又为什么要拿给我呢？有种什么东西开始在我心里头颤动了。

“这船票我买不起，”我最后用德国话说。“那要花一大笔钱咧。在里斯本，有钱的难民有的是，你要多少，他们能给你多少。你找错了人啦。我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

“我不是要卖钱，”那个人说。

我又转过眼去望望那两张船票。“那是真正好用的船票吗？”

他把船票递给我，没说一句话。它们在我手指中间窸窣作响。那不是假的。把它们拿到手，是关系到毁灭与得救的大事。即使没有美国签证这两张船票我还不能使用，可我凭着它们毕竟还可以在第二天早晨试一试去搞个签

证——或者，至少我还能把它们卖掉。那就意味着可以多维持六个月的生活。

“我不明白，”我说。

“你不妨拿去，”他答道。“不要你一个钱。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里斯本。那只有一个条件。”

我的胳膊耷拉下来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美妙，简直不象是真的。“什么条件？”我问。

“今天夜里，我不愿意一个人待着。”

“你是要我跟你待在一起吗？”

“是的。一直到明天早晨。”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吗？”

“就是这么一个条件。”

“没有别的条件了吗？”

“没有别的条件了。”

我表示怀疑地瞅着他。我知道，当然罗，象我们这种处境的人是会支持不住的，而孤独，有时候是会叫人忍受不了。我知道这种对空虚的害怕心情，它给那些世界已成为虚空的人以一种打击，而我也知道，哪怕有一个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来作伴，也会把一个人从自杀中挽救出来。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人们互相帮助原是理所当然的事，本来无需乎给予什么报酬。更谈不上是这样一种报酬：“你住在哪儿？”我问。

他做出一个否定的手势。“我不愿意到那儿去。这个时候还有酒吧间开着吗？”

“那总该会有的。”

“有没有供难民就餐的地方？象巴黎的玫瑰咖啡馆那样？”

我知道那家玫瑰咖啡馆。露特和我在那边睡了两个星期。只消一杯咖啡的代价，老板便让你待在那儿，你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把几张报纸一铺，就睡在地板上。我从来不睡桌子；睡地板你怎么也不会摔下来。

“我一个地方也不知道，”我答道。这不是实话，可是你总不会把一个想要把两张船票送掉的人带到那么一个地方去嘛，在那个地方经常进出的人，为了要搞到那两张船票，会把灵魂都出卖咧。

“我只知道一个地方，”那个人说。“我们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它还开着。”

他向一辆孤孤单单停在那儿的出租汽车打了个手势，一面朝我看了一眼。

“好吧，”我说。

我们坐进汽车，他告诉司机一个地址。我一心想让露特知道，那天夜里我不回家了；可是，我一坐进这辆黑糊糊的、有股臭烘烘味儿的出租汽车，一种非常强烈、非常惊人的希望便向我猛袭过来，弄得我的头脑差一点发晕。说不定这一切确确实实都是真的；说不定我们的生命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正在出现，说不定我们就要得救了。这个念头一闯进我的脑海，我就生怕这个陌路人闪出我的视野，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瞬间。

我们绕着那剧院模样的集市广场走着，过了一会，来到一条条坡形的小巷和梯级的迷阵中间，里斯本的这一带我并不熟悉，象往常一样，我所熟悉的主要是教堂和博物馆——倒不是由于我那么敬爱上帝或者喜爱艺术，而只是因为教堂和博物馆里，没有人来查看你的证件。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艺术大师面前，你仍然是一个人——而不是什么带着可疑证件的个体。

我们走下出租汽车，继续往上攀登那梯级和弯曲的街道。有一股鱼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阳光和睡眠的味儿。初升的月亮底下，圣乔治城堡在黑夜中矗立在一边，月光如同瀑布一般直往梯级上泻落。我转过身子，俯视着港口。下面是那条河，河是自由和生命，它流进海洋，海洋是美国。

我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希望你不是在捉弄我，”我说。

“不，”那个人说。

“我指的是那两张船票。”刚才在码头上，他已经把两张船票又放回他口袋里去了。

“不，”那个人说。“我没有在捉弄。”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那就是我讲的那个地方。这会儿它还开着。我们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几乎所有的顾客全是外国人。他们会以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上船之前正在庆祝我们在葡萄牙的最后一夜。”

这个地方属于夜宵餐室这一类，有着一小方舞池，还有

一个平台，原是为旅游商业兴建的。有人在弹奏六弦琴，后面有个姑娘在演唱一支忧郁的葡萄牙民歌。平台上，有好几张桌子都给外国人占了。有一个女人穿着一身夜礼服，一个男人穿着一套雪白的晚礼服。我们就在平台尽头找到一张桌子。你可以俯瞰里斯本，看到惨白月色下的教堂，街道，港湾，码头，还有那条方舟似的船。

“你相信死了以后还会生存吗？”那个带着两张船票的人问。

我抬起头来望着。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问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最后我说。“近几年来，我一直忙着为我未死之前的生存问题操心。你的问题，等我到了美国以后再考虑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以便提醒他曾经答应给我的那两张船票。

“我不相信，”他说。

我宽慰地舒了一口气。什么话我都准备听，可就是讨论问题我却受不了。我心神太不安宁了。下面就停着那条船嘛。

那个人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工夫，象是睁大了眼睛睡着了似的。随后，当那个弹奏六弦琴的人走到外面平台上的时候，他才醒了过来。“我姓施瓦茨，”他说。“那不是我真的姓，是我护照上的姓。可是我已经用惯了。今天夜里这样叫就行啦。你在法国住过很久吗？”

“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也一样。我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过去了。“我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得多。”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象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看样子他仿佛难以形容，而且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一九三九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里。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个什么人说了，那些个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就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什么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个损失就更加难以

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那么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集中营里被杀害而且焚化了。我常常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时起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要来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既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叫做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也没流露出半点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一种爱慕的感情。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不幸者的面前，也会感到饥饿，而这并非出于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几个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三九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

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难民了。三八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个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象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象是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为的是一再非法入境。又来了那么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巴塞尔，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作为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象旅馆一样开放着暖气。”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它们会

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一会儿之前你还认为并不是这样。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完全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的监狱。可是，这儿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象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的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样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熟睡了。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学位论文咧，”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①，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太太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活象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个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来，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① 德国的一个城市。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好玩儿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不是好玩的事儿。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已经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者把他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个个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象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它的味儿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来一下第二个慕尼黑，或者第三个慕尼黑，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象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而且是在根本没有奇迹的时候。”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不可告人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开始的。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个姓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我是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①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

^① 巴黎的一所博物馆。